

福尔摩斯与奥斯丁

——重读杨绛的小说

许 江

内容提要 福尔摩斯与奥斯丁出现在杨绛的小说和论文中，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本因素，也成为重读、细读杨绛小说的新的角度。福尔摩斯带来的首先是故事性、趣味性和悬疑性的植入，用侦探命案的冷静而执着的方式来审视、探查人事的奥秘；其次是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带有某种神秘性，有时竟像一个谜。奥斯丁虽然对杨绛的小说创作影响至深，可不愿顺着写的杨绛却另辟蹊径，走出了奥斯丁的围城，在叙事结构、人物设置和写作观念上都呈现出不同的追求。杨绛巧妙地将福尔摩斯和奥斯丁嫁接在一处，融悬疑紧张与浪漫温馨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

在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中，许彦成和姚宓之间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爱恋是一条主要的情节线索，若从这里讲可以把姚宓看做小说的女主人公。但这位女主人公的主要戏份是从第八章才开始的，在此之前读者未必能预测到她在小说整体叙事结构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章的开端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情节：

姚宓一回家就减掉了十岁年纪。她和姚太太对坐吃饭的时候，鬼头鬼脑地笑着说：

“妈妈，你料事如神，姜敏的妈真是个姨太太呀，而且是赶出门的姨太太。妈妈，你怎么探出来的？”

姚太太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会做福尔摩斯呀！——姜敏的亲妈嫁了一个‘毛毛匠’——上海人叫‘毛毛匠’，就是洋裁缝。她不跟亲妈，她跟着大太太。家里还有个二太太，也是太太。她父亲前两年刚死，都七十五岁了！妈妈，你信不信？”……

姚太太看着女儿的脸说：“华生！你这是

从陈善保那儿探来的吧？”

“妈妈怎么又知道了？”

可是姚太太好像有什么心事，她说：“阿宓，咱们今天没工夫玩福尔摩斯，我有要紧事告诉你呢。”^①

他人的隐私得来不易，靠的就是福尔摩斯式的办案手段，福尔摩斯是他们的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剂。一句“我也会做福尔摩斯呀！”读之不禁令人感到意外、不协调、不寻常，类似的小情节在《洗澡》第十二章、第二部第七章以及尾声中还多次出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福尔摩斯与姚宓母女都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不仅如此，这个通俗侦探小说里的大人物与《洗澡》，与杨绛，都会令人感觉如平行线一般难以靠近。姚宓那样一个规规矩矩、家学深厚的淑女、才女竟会对性情古怪、偏执狂似的福尔摩斯如此有兴趣，这似乎并不符合常规；对于《洗澡》这样一部描写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说而言，特别是在前面情节、环境描写的惯性之下，福尔摩斯的骤然出现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而对于杨绛来说，福尔摩斯的出现就更有值得探究的内涵和意义了。

在她为人熟知的一篇论文《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杨绛又引用了福

尔摩斯来解读问题、阐发观点：

伊丽莎白和吉英经常像福尔摩斯和华生那样，一起捉摸这人那人的用心，这事那事的底里。因为社交活动里，谁也不肯“轻抛一片心”，都只说“三分话”；三分话保不定是吹牛或故弄玄虚，要知道真情和真心，就靠摸索推测——摸索推测的是人心，追寻的不是杀人的凶犯而是可以终身相爱的伴侣。故事虽然平淡，每个细节都令人关切。^②

杨绛的论述充满了奇异而令人惊讶的因素。公共社交中的心机和玄虚，亲切和善的表面下也许就是恨之入骨的咬牙切齿，一句听起来悦耳的赞扬声里又会包藏着多少嫉妒和嘲讽，杨绛短短的几行文字便令我们感受到人性的复杂难测、人情的离奇冷暖以及那故事背后的“好”。伊丽莎白和吉英与福尔摩斯和华生、杀人犯与爱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叙事组合，传奇大侦探的符号化介入使这一切具有了迥然有别的气质。

在同一篇文章里，杨绛还讲道：“奥斯丁也像侦探小说的作者那样，把故事限于地区不大、人数不多的范围以内。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和内心的任何波动，都筹划妥帖，细枝末节都不是偶然的。……奥斯丁的《艾玛》（Emma）也可说是一部侦探小说。其实奥斯丁的小说里，侦探或推理的成分都很重。”^③杨绛的读法泄露了一些不易察觉的重要信息，奥斯丁的小说和侦探小说看来都是杨绛喜欢的读物，它们给杨绛带来了编故事、写人心、勘世情的灵感。将奥斯丁的小说当做侦探小说来读，杨绛也许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理解她本人小说创作的道路，那些对于奥斯丁小说特征的描述又何尝不适用于她的小说呢？

作为一位小说家，杨绛的作品并不多，主要是一部短篇集《倒影集》，一部不到二十万字的长篇《洗澡》，2014年她103岁之际还续写出版了一个中篇《洗澡之后》。尽管作品不多，但就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著名小说家一样，凭借有限的作品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位置，永远地拥有一批喜爱、推崇他们的忠实读者。

对于杨绛及其文学创作，近三十年来很多学者做过深入而有趣的论述。譬如，《旧中国都市一角的素描》^④一文将《倒影集》作为研究对象，探

究了其中几篇小说各自不同的特色，认为它们在整体上“呈现出温婉、平和、淡雅的格调”，运用写实手法描摹了三四十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风情。《读〈洗澡〉》^⑤详细地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饶有兴味地从三个部分的标题“采葑采薇”、“如匪浣衣”、“沧浪之水清兮”深入探究了小说内在的叙事结构与思想情调。《杨绛论》^⑥从杨绛的家世和生平入手探讨她文学作品的内涵与风格，提出了“杨绛就是姚宓”、“《洗澡》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材的小说”这样很有意思的观点。《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⑦综合评析了杨绛的各类作品，着重对杨绛创作中的人性内涵、隐身衣哲学与中和之美进行研究，认为“她的创作基本上是远离时代主流的”，将杨绛定义为“一个边缘性的作家”。《取法经典 阅世启智——杨绛的小说写作观念》^⑧重视理论探讨，认为塞万提斯、菲尔丁、萨克雷、奥斯丁和曹雪芹对杨绛小说观念的形成都有影响，并从九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论述杨绛散文、戏剧创作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更有为数甚多的一类论文对杨绛的人格风采大加赞誉。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在对杨绛的各类作品表现出敬意和赞赏之情时，相对而言却忽略了她的作品中某种令人印象深刻且有符号性意义的趣味性、故事性乃至通俗性。阅读杨绛的小说给人的感受首先是轻松和愉快，而非感伤、苦闷、沉郁或激愤，这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很多经典的严肃小说并不相同；另一方面，如果作为一个因素参考的话，杨绛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打定主意搞创作的初衷是贴补家用，同时又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朋友的督促、鼓励使然，而并非是拯救国族、国民灵魂之类的宏志，她“不会给读者讲moral，也不会说教”，“写作之前，没有主题；写作中，也不介入”^⑨。因此，对杨绛小说的解读似乎需要另一只眼、另一种视域。

二

福尔摩斯，英国人柯南·道尔系列侦探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生性孤僻、观察力惊人、无往而不胜的私家侦探，自从19世纪末被创造出来之后，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都市传奇人物。1896年梁启

超在其主办的《时务报》上连载《英包探勘盗密约案》，1899年单行本出版，这是这位传奇大侦探走进中国最初的脚步。随后，福尔摩斯的大名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他的探案故事在各种杂志上不断面世，一位叫做程小青的作家还模仿着创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他的霍桑探案故事结集出书三十余种，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与追捧。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27年世界书局又出版了白话文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两套全集令中国的新老福尔摩斯迷们大饱眼福，对福尔摩斯热的经久不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而言，以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不仅是他们娱乐、消闲、智力训练的方式，而且成为他们开眼看世界的一扇窗、构想未来的一种渠道。^⑨钱锺书也是一位侦探小说迷，杨绛曾追忆，钱锺书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因学业无趣，“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⑩。

福尔摩斯究竟给杨绛的小说创作带来了什么呢？那既不是哥特式小说的阴森恐怖，也不是所谓寓教于乐的文学精神，更不是什么尊重科学的现代性意识。这位大侦探带来的应该首先是故事性、趣味性和悬疑性的一种植入，悬念迭起，疑窦丛生，用侦探命案的冷静、执着的方式来审视、探查人事的奥秘。

《ROMANESQUE》几乎就是一篇侦探小说，男青年彭年将姑母的珠宝偷出来卖，却上当受骗，被软禁起来，又被一个妖烧的妙龄女郎搭救，两人遂成为情侣，正当他们打算一起出逃时，女郎竟神秘地失踪了。女郎带彭年逃出、彭年追踪女郎的片段都像极了福尔摩斯小说中的情景。《“大笑话”》里突然而至的女主人公陈倩引起了各方的兴趣，因为有些姿色遂招来了嫉恨，后来被恶毒妇朱丽设计陷害沦为笑柄，整个故事充满了一种侦探小说的悬疑性和紧张感，只是差一步没有发生命案而已。小说特别详细地、几近于自然主义手法式地描写了朱丽如何一步步巧设饭局、假造纸笺密约、又故意使人撞见的整个过程，读之令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为陈倩和林之瑜担心，恨不能进入小说提醒两人快走。《鬼》由胡彦来到官

绅人家做先生而遇鬼，写到被卖为妾的贞姑娘夜闯书房与胡彦幽会而怀孕，她肚里的孩子要被调包给不孕的少奶奶，不想这少奶奶竟因装产妇装得太像而丧命，扑朔迷离、始料不及的情节十分吸引人，倒叙的结构、阴郁的气氛与经典的福尔摩斯小说颇为相似。

《洗澡》中的“文学研究社”便是杨绛自云的那种侦探小说最喜爱的空间，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过去的故事，他们带着那些不肯示人的前史聚到一处，朝夕相处，小说一开始便营造了一种充满悬疑色彩的环境和背景。在第四章文学研究社成立的大会上，好色、吝啬、装腔作势的余楠用一双眼睛扫过会场，他在搜寻那个传说中“最标致的小姐”，小说接着便提到了伶俐可人的姚宓，但并未直说她就是那个“最标致的小姐”，而是笔锋一转写道，余楠看到姚宓不知和谁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不易察觉的小动作旋即成了小说埋下的一个极具悬疑色彩的伏笔，它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去寻找那个眼神的答案。但作者不紧不慢在第五章直至第七章才一点点地逐步揭开了答案，读者在恍然大悟的同时，却又被投入到另一个猜谜的过程中，许、姚彼此之间不妥的好感究竟会如何发展呢？第二部第八章许彦成和姚宓约好同游香山，许彦成却临阵猛醒而退缩，但又着实放不下，于是尾随姚宓上了车，这章最后突然写道：“可是过去的事却不容易抹掉。因为她低头站在开往香山的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的时候，有人看见她了。不但看见她，也看见了许彦成。”看似平静下去的水面又突起一个大波澜，好一个悬念的设置，刚要放下的读者又被钓起了胃口，巴不得立即知道究竟是谁看见了他们，又会怎样揭露这件事？小说第三部里，“三反”运动大幕开启，历史滚滚而来、轰然而去的车轮之下，各色人等藏起来的尾巴都要被拽出来割掉，他们不为人知的前史将大白于天下，怎么割？先割谁后割谁？能挖出什么隐私？许彦成和姚宓的命运又会怎样？悬念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应接不暇。另外，小说开端两章写无聊文人余楠的猥琐情史，总让读者期待从这个人物身上发现一些新故事，但从第三章起作者只是有时想起他而多数时候都把他当作一个陪衬，读者则会不断地搜寻这个人物的身影，而“搜寻”本身便具有悬疑色彩，尽管最终一无

所获，但越发觉得这个人无聊了。

《洗澡之后》写得极简，亦不失悬疑的气氛。那个在《洗澡》之后出现的、可爱的女孩子小李与姚宓一见如故，她说：“姚姐姐，我很会假装呢！”可又不愿说明、说透，读者读到这里想必和姚宓一样急着要探寻这个女孩究竟还假装了什么。小说借此自然地带出了小李的家世，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许彦成与姚宓在最高学府图书馆书库重逢，许彦成一句“阿宓，我好想你。”瞬间便激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他们真诚、强烈而克制的感情究竟会如何收场呢？

福尔摩斯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杨绛笔下的人物往往带有某种神秘性，有时竟像一个谜，让人费劲去猜。《ROMANESQUE》中侠女、风尘女子一般的妙龄女郎，《“大笑话”》里传说了十年而突然出现的未亡人陈倩，《“玉人”》里让妻子耿耿于怀的第三者，《鬼》里面的那个“鬼”，乃至《事业》里始终独身的老小姐默先生，几乎莫不如此。《“大笑话”》是《洗澡》的一次彩排和预演，虽然篇幅较之后者短得多，但写到的人物以及人物关系几乎不比后者少和简单。俨然是世外桃源的平旦学社，宁静平淡的生活被打破了，死了两年的研究员王世骏那从未露面的太太陈倩“翩然临社”，社里的一众妇人好奇地巴不得立马将这个神秘的未亡人翻个底朝天，她和王世骏的关系到底怎样？为什么十多年从不露面？她此行究竟有何目的？在这样充满是非的环境中，本来是“高汤”的陈倩的好奇心和好胜心也被挑动了起来，她和有妇之夫、学社研究员林子瑜产生了似有似无的感情，与自以为姿色第一的朱丽暗自较劲，成了别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的棋子。小说有一段写陈倩单独来到林子瑜的书房，向他澄清自己，博得了林的同情和好感，陈倩那似是处心积虑又似无意为之的手段，更是增添了这个女人的神秘性，直到小说结束，读者也无法猜透陈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她的前史是像她自述的那样还是另有更加丰富的隐情？但作者至此不再往下写，她似乎有意地留下了这个谜，陈倩于是成了杨绛笔下最令人琢磨不透的女性角色。

《洗澡》里二十出头的姚宓，因为家庭原因和感情经历而防人之心甚重，是个小才女又是传说中“最标致的小姐”，在一千人等眼中自然也涂上

了神秘的色彩。杨绛在写这个人物时也是颇费心思的，她一直在保护着她，不让她过早抛头露面，她的出场是又一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戏份，她的痛苦羞辱的感情经历到了适当的时候由她自己讲给信任的人听，读者竟像偷听似的知道了一切；她最终的主动退出，不禁令人感叹这个女孩子所能有的理智和定力，又不禁令人怀疑她对许彦成的感情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小说一方面把她塑造成了最纯真的人物，一方面又丝毫不避讳她的是非心和小女人模样；而在第三部风雨大作、人心惶惶的“三反”运动中，作者干脆让这个可心的人若远若近、半隐半现，尽可能地远离是非动乱的漩涡。姚宓身上的某种神秘色彩一直保持到了小说终篇，正是因为神秘，所以迷人，所以有魅力。在《洗澡之后》里，姚宓似乎更有魅力了，她抛却许多包袱，脱掉灰布制服，穿上了“很考究的薄夹衣”；在与许彦成简朴的婚礼上，她大放光彩，如同失落凡间的仙女，可是她那处女般的犹疑、羞怯和凛然依旧延续着她的神秘色彩，令人浮想联翩、欲说还休。

实际上，福尔摩斯不仅仅是福尔摩斯，他代表着侦探小说的路数和力量。突然而至或突然而逝的主人公，人物背后的爱恨情仇、恩恩怨怨等等，都是这类小说用以经营故事情节、屡试不爽的惯技，杨绛也在用，只是她对凶杀命案这类极端化的情节不感兴趣，她用福尔摩斯之眼观察、探测的不是命案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敏锐、机智的旁观者、窥伺者、介入者的混合体，造就了杨绛小说人物塑造的独特视角：人生是欲望的种种形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任何人都表示出了宽容和理解，同时潜隐着一种深刻的怀疑与挑剔的审视。

三

然而，杨绛并不想写侦探小说，更无意成为一个侦探推理小说家。虽然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故事对她的创作影响较深，但她的小说里显然并非只有福尔摩斯的影子，她没有刻意营造悬疑，所有的悬疑都自然平顺地潜伏在情节流之中，在需要的时候浮出水面；她的小说没有那种紧张、阴沉的气氛，虽然人物大都神秘，故事情节具有悬

疑性,但并未向极端的形式发展,神秘的人物不久便为人所知,悬念也不是一定要到最后时刻才被揭穿。杨绛的笔下没有传奇故事,有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情态,“都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写世态人情,写表现为世态人情的人物内心”^⑩。在这一方面,她无疑又是深受奥斯丁影响的,杨绛本人对奥斯丁也是青睐有加,只要看看《有什么好?》一文中的由衷赞叹便可确信无疑。然而杨绛对奥斯丁又有很多不忠之处,她在那里获得灵感却最终走出了奥斯丁筑就的围城。

两人之间的不同首先可以从下面这个角度解读。杨绛的小说有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一对接近中年的夫妻,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危险的关口,这时恰好出现了一个善解人意、聪明而有教养的美女,或者是风韵犹存的女人,又或者是旧情人,给这个不稳定的家庭带来巨大的冲击。《小阳春》、《“大笑话”》、《洗澡》都是这种经典的叙事结构,《ROMANESQUE》、《“玉人”》、《鬼》则是以这个叙事结构为本在叙事角度上稍有变化的作品,《洗澡之后》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帅气、文质彬彬的叶丹作为第三者的出现倒最终成全了两个幸福的家庭。简言之,杨绛的小说无论表面上讲的是什么故事,核心里都有一个男人,基本上都是已婚男人,发生外遇或者艳遇,都有所谓的不伦之恋和不道德的感情。尽管从《小阳春》开始都是写男人的外遇和不忠,可是到了《洗澡》及其续篇,杨绛对有了外遇和不忠的男人许彦成却表现出一种宽容和理解,此前小说里那种表面不动声色骨子里早已嗤之以鼻的做派差不多一扫而光,许彦成可谓杨绛笔下最受赞赏的男性角色了。

奥斯丁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她笔下的核心故事都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子期待、渴望着一个如意郎君的降临,故事的结局往往是一场幸福的婚姻、命中注定式的完美结合,她写的是婚前的故事,而杨绛写的大都是婚后。男人特别是已婚的中年男人从来不是奥斯丁的主角,她对这种人物没有兴趣。无论是《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和宾雷、《艾玛》中的奈特利、《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他们可能年龄、身份、性格、地位有差距、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未婚男士,尽管有人生活并不检点,但那仍然不是小说描写的重心。实际上,奥斯丁对这些未婚男士也不是很有兴趣,

她是在观察、研究他们,这种目光是外在的,有时是颇为冷漠的,她真正有兴趣、怀着满腔热忱去描写的是那些形象、性格、命运各异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吉英、艾玛、埃莉诺、玛丽安等,她深入她们的心灵、血脉,与她们感同身受、不离不弃,用她们的心和眼去看男人,看这个世界,通过这些女主人公传达她自己内心对世界和时代的真实想法。

这又与杨绛不同,在她的小说特别是《洗澡》里,杨绛很多时候是从许彦成的角度来讲故事的,是用许彦成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圈。她甚至会直接化身作男性角色,用他们的眼睛来看女人,譬如她有时会从许彦成的角度看姚宓,有时会从余楠的角度看姚宓,有时又会从其他男性角色看姚宓,这些人的出发点不同,姚宓呈现出的形象也是大为不同。杨绛还常常借用男性角色的口吻表达她的看法,譬如她曾借许彦成之口感慨:“美满的婚姻是很少的,也许竟是没有的。”这种写法弱化乃至取消了她作为女性作家呈现的文本可能应具有的性别色彩。

其次,杨绛与奥斯丁的不同之处又体现在,后者善写冲突激烈的场面,乐在其中,杨绛则不然,情节的高潮往往是回避的,似乎是要把戏剧化的成分降到最低。杨绛笔下多有男人的婚外恋,女人的相思之苦,但她从不让他们走向极端的不归路,他们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颇合乎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想。《洗澡》中许彦成和姚宓有很多单独相处的机会,作者至少三次写到他们密约私会,但具体的描写都相当克制,有时则干脆不写,譬如第二部第十七章写许彦成与姚宓在藏书室密会便是如此,过程根本一字未露,读者只能看到他们“已重归平静”,两人之间仿佛“已有一千年的交情”,“已经相识了几辈子”,而他们的情感交流大都是通过书信这种有距离感的方式达成的。又如两人约好同游香山,正当读者期待他们的情感可以借此大进一步之时,许彦成却退缩了,本该到来的高潮戏就此戛然而止,读者可以理解这种安排,但还是感到遗憾和意犹未尽。第三部里,“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文学研究社的人——“洗澡”、交待,丁宝桂、朱千里、杜丽琳、余楠纷纷登场,整个过程令人唏嘘感叹而后怕不已,但最令人期待的许彦成的交待被作者几句话

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了，高潮戏又一次擦肩而过。此外，诸如《ROMANESQUE》中急遽的结尾、《“大笑话”》中模模糊糊的感情、《“玉人”》中与“玉人”的相遇、《鬼》里面的一夜情，都是类似的情况。而在奉行简朴风格的《洗澡之后》里，这种处理方式简直臻于极限。姚宓和许彦成在图书馆书库的重逢几乎隐没在情节的流动当中，如吉光片羽一闪而过；杜丽琳与叶丹相爱，与许彦成离婚，三人竟能在同一屋檐下相安无事，所谓冲突尽已化为乌有，近于“五蕴皆空”的佛境了。

在奥斯丁的小说中却常能看到精彩激烈的话语交锋、真诚热烈的情感表白与极端对立、骤然反转的情节冲突，它们对小说气氛的营造、剧情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表达都有重要的作用。譬如《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直接登门向伊丽莎白求婚那场戏，达西的傲慢与不解风情、伊丽莎白的偏见与严词拒绝，读之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凯瑟琳夫人知道达西要正式向伊丽莎白求婚，气势汹汹地来到伊丽莎白家试图命令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求婚，抛弃偏见的伊丽莎白不畏权贵，几句话令高高在上的凯瑟琳夫人哑口无言；小说结尾处，达西与伊丽莎白尽释前嫌，相互表白，真正达成了心灵的默契与沟通。又如《理智与情感》中埃莉诺与爱德华之间终于冲破自我束缚的理智和误解而发出的情感表白，《艾玛》中自认聪敏的艾玛与真正睿智的奈特利的多次交锋与最终结合，都成为经典的故事场景令人荡气回肠。

虽然杨绛非常赞赏奥斯丁的小说，但杨绛显然不愿顺着奥斯丁写，她要另辟蹊径。人生百态、人性的丑与恶、现实的残酷、生活与玩笑、男人和女人、爱情与婚姻，奥斯丁是一定要要将它们写透的，而杨绛则不愿去深写细描，只是点到为止或者写高潮过后的尾声，这不仅仅是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的问题，经历过更多苦难的杨绛似有更加博大的宽容与理解之心。正因如此，当有人问杨绛是否能接受奥斯丁与她的写作风格最相近这种说法时，她断然地回答：“不能接受。”^⑩

福尔摩斯与奥斯丁，两段截然不同的枝条被杨绛以不同的方式嫁接到了她精心培植的树干之

上。奥斯丁让杨绛关注人情的细腻、琐碎，人类傲慢与偏见的本性，看似平淡实则有趣的、没完没了的日常生活，但杨绛发展了自己的才华和境界，很多人眼望着奥斯丁这座围城想进去，而她是已经出来了。福尔摩斯让杨绛关注人情的凶险、丑恶，用一种极端敏锐的、怀疑一切的冷静目光来勘破生活虚伪的表象，福尔摩斯面对的、试图破解的是一桩桩凶杀命案，杨绛面对的、试图破解的却是更加具有迷惑性、更加根本的人情、人心和人性。一边是福尔摩斯式的推理小说，情节多变，人物神秘，总是有一个悬疑等待揭晓，一边又是奥斯丁式的世情小说，富有浪漫、轻松、温馨的气息，爱情与婚姻是永远不变的核心。杨绛先生巧妙而睿智地把它们混溶起来，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料，形成了一种独特而成熟的、具有大家风范的艺术风格，令人难忘。

①杨绛：《洗澡》，《杨绛文集》第1卷，第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下文所引《洗澡》片段皆出此版本，不再加注。

②③⑫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杨绛文集》第4卷，第338—339页，第338页，第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田蕙兰：《旧中国都市一角的素描——杨绛〈倒影集〉漫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⑤孙歌：《读〈洗澡〉》，《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⑥胡河清：《杨绛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⑦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⑧于慈江：《取法经典 阅世启智——杨绛的小说写作观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

⑨⑬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⑩参阅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420—4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⑪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杨绛文集》第2卷，第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